



勤勤恳恳，我只赚辛苦钱

扬勤廉正气
创美好生活

紫金文艺评论

诗舞情韵的南京表达

——评舞蹈诗剧《南京轶事》

汪政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创作演出的舞蹈诗剧《南京轶事》是一部新颖别致、创意独特的作品。

说起南京，就是十朝都会、帝王之州，就是十里秦淮，就是惨烈屠城……这些都已经成为南京的符号性标签。所以，南京题材的作品都是沉重的、沉痛的，都是历史的、过往的，也都是感伤的、悲剧性的。《南京轶事》的创作者们采取的是举重若轻的方法。他们没有用南京的历史束缚自己，也回避了大量南京符号性的表达对自己的限制，而是去选择、跳脱，以生活的、平民的、当代的视角去纵览南京，解读南京，于是，他们对南京有了新的发现。

作品舍弃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而是撷取了历史中与南京相关的典故，事件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从“堂前燕”到“1937”，再跨越到当今南京城市建设的新面貌，用串烧式的、舞蹈片段连接的方式来呈现一种时空的穿越。从古至今，既包含了南京建城历史、重大历史事件，又体现了民俗文化、社会热点、人文趣事。比如作为序幕的“汤山源起”，以神话的方式图案性引出了南京的自然与人文起源，一下子拉长了南京文明的审美性表达。特别是《流徙图》《金陵制造》《骑车趣事》《读报热》《唱情歌的季节》《欢喜》等舞段，给观众展示了南京这座城市丰富多彩的一面。事实上，城市表达总是某一认知主体对城市的个性化表达。南京当然是历史的南京、客观的南京、习惯认知中的南京，但它也是现实的南京、主观的南京和个人化的南京。当生活的观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社会的共同追求时，对历史的回望就带有了生活史的价值出发点，南京被从生活史、风俗史的角度进行了新的表达与联接，《南京轶事》也因此更具有质感和烟火气。

与此相应，《南京轶事》富有启发性的文化与审美视角是它的平民性，它最大程度弱化了南京的帝王身份，将它放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哲学是《南京轶事》的深刻之处，也是它的闪亮之处，它从另一个角度照亮了南京的历史，揭示了南京这座饱经战争之苦的城市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也因为作品的这种当代性、个性化表达与日常生活的平民视角，不仅使作品叙述出了南京人的故事、南京人的历史，更塑造出

了另一种南京的形象，展示出南京人丰富的性格、多样的面容。

作品中呈现的《虎踞龙蟠》《堂前燕》《台城柳》《天下文枢》《秦淮河边元霄》《1937之殇》《百万雄师过大江》《冬至——幸存者》《南京长江大桥》《春江水暖鸭先知》等组元，又让我们在陌生中见到了熟悉，在柔软的生活叙事中触摸到了历史的硬度。作为后来者，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到城市新形象的塑造中去，另一方面又要加入城市形象构建的历史中。所以，《南京轶事》固然给了我们生活的南京、世俗的南京、平民的南京，但依然有所选择地将南京历史上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具有高度辨识度的人文景象编排进了作品中。如何表现六朝风貌，《南京轶事》选择的是堂前燕和台城柳，它没有用故事与人物的方式，而是选择了诗歌意象来表现六朝的气息、风度与风情。再如，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也与南京密切相关，正是南京学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对这一事件作品并没有正面叙述，而是用比喻的方式，借助古典诗歌意象、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来进行表现，以比兴的方式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诗意地呈现出来。另外如对江南贡院的表现也极为别致，这是这部舞蹈诗剧的华彩乐章。它同样是化繁为简，举重若轻，通过经典的伴读将传统文化诗意地融进了作品，浓墨重彩、反复渲染，群舞则以其特有的表现力烘托出了华丽的意境，从而使作品生动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阻挡的征服力。

整部作品以时间为线索，从创作者对南京城市的理解出发，选择他们认为能够表现南京、塑造南京的事件、场景以舞蹈的形式将它们联接成一个艺术整体，似断实连，化实为虚，如同一首流韵的抒情诗。作品在舞蹈语言的选择上打通中西古今，可以说是多种舞蹈艺术的全面展示。包括舞台空间的布局、舞美的设计、音乐创作等等元素都有许多创新而又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连同道具的抽象化和在不同语境中的作用都体现创作者细节上的精益求精。

这是一次很有新意的尝试，它喻示着南京表达新的可能，同时也喻示着舞蹈艺术的新空间。

李可染的山河情怀

李良

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画家的图像、欣赏者的性情，山水画是中国画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山水画以山为德、以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让一部中国山水画史成为了一部中国思想史。观察李可染的山水画创作，其精湛艺术和山河情怀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是脱离不了时代影响的。李可染出生于上个世纪初期的徐州，父母皆目不识丁。1923年，李可染小学毕业后只身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29年，母亲倾其所有，拿出20元的积蓄给李可染去成立不久的国立杭州艺术院求学深造。从徐州到西湖，看到帆船都激动不已的他，跑遍了杭州每一座山、每一条路，杭州山河之美，几乎尽入眼底。

艺术才分显足的李可染，遇到不拘一格拔擢人才的院长林风眠，为中国现代绘画史留下了一段了不起的佳话。林风眠将自己留法期间创作的一批巨型壁画作品悬挂在院部的墙上，《人道》《摸索》《白头中》等带有强烈人道色彩和人生观照的作品，引领着好学求进的李可染进入生活的现实，与时代激流共命运同呼吸。

李可染早期艺术思想更直接的影响来自同学共产党员张眺。受张眺影响，李可染以普罗文艺为方向。1931年夏，国立艺术院发展组建了上海“一八艺社”。同年5月21日，“一八艺社”在上海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习作展览会，鲁迅先生为展览会专门写下《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预言“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定能战胜那貌似强大、“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的内容空虚的所谓“高级”艺术。

为人生的艺术观念也促使李可染的美术思想变得越来越坚硬有力。1937年11月中旬，徐州会战在即。作为徐州民教馆抗日宣传队骨干，李可染深入乡村宣传抗日，到村头写抗日标语，画宣传画，绘制抗日壁画，走上了文艺抗日的道路。1938年5月，徐州沦陷，李可染赶赴武汉，继续抗日宣传。武汉失守后，李可染从长沙经湘潭、衡山、衡阳到达桂林。一路上，走到哪里就

画到哪里，把抗日的烽火点燃到哪里。

1941年，李可染迁到一户农民养牛棚旁边的一间低矮的小屋里居住，在一盏油灯下伏案读书、作画，又听见那头水牛嚼草、反刍、蹭痒的声音。万籁俱寂的时候，那清晰的声音对敏感敏锐的艺术家来说，激起了他的灵感。适值民族处于危难时刻，正需要以坚韧、强犛的精神力量来唤醒民众。李可染从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把牛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于民族国家的满腔热爱情怀中请牛入画。从此，李可染画牛不断。李可染的牛，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并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

山水画界流传一句话：山水画家不入川难成大器。金刚坡下几十亩水田反射出耀眼金光的碎镜，在李可染以后40年的山水创作里，变化不尽。李可染“金刚坡”时期对于山水画的揣摩与精进，不和他织诗传抱石并为之切磋交流是分不开的。自此，他更属意于祖国的壮阔山水。

1954年，第一次江南写生是李可染迈出了中国画改革的试探性一步。这次江南写生让李可染坚信只有到大自然里去、到生活实践里去才能化蛹为蝶。1956年，李可染再度出去写生，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反复寻景写生8个月，路程数万里。李可染要“为祖国河山立传”，由“对景写生”发展到“对景创作”，他完成了山水画风格的自我建构。

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诗词逐渐成为中国画坛极为重要的创作主题。结束多年写生、重新回到画室创作的李可染，也自然而然地开始涉足这一题材，有“长征”“韶山”“井冈山”等系列题材作品问世，其中尤以《万山红遍》最具代表，整个画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营造“万山”之幽深辽阔境界。寸山河寸寸金，对国家天地有大爱方为大家。立意“为祖国山河立传”，李可染对民族文化有着深挚的热爱。山水是自然的，山水画是审美的，山水画家心里只有装着人民才能俯仰天地大道无限。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文学界引发热烈反响之际，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于12月18日在天津举行。江苏作家赵本夫以《荒漠里有一条鱼》获得长篇小说奖，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敏以《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摘得中篇小说奖。颁奖之后，本期《文艺周刊》采访了两位江苏作家，请他们谈谈两部作品背后的创作感想——

赵本夫：

写出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

本报记者 冯圆芳

“大开大合、混沌刚猛的结构和语言”“展现出中华民族坚韧强悍的生存意志与能力”“深邃厚重的民族寓言”……百花文学奖为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拟定的颁奖词，可谓恰切得当。在这部具备史诗品格的巨著中，赵本夫根据故乡丰县流传的一则传说——一条在黄河故道上搁浅的鱼儿靠着腮边含着一团泥顽强存活，生发出古老民族坚韧不屈、繁衍不息的生存寓言。

“我想书写的是中华民族的韧性，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感！”赵本夫对记者说。书中，哪怕逃荒要饭，鱼王庄村民也没有忘记栽树，栽树既改善生存环境又惠及千秋后代，这直白的逻辑如基因一般烙印在鱼王庄的血液里，成为村民们身上那股拙朴却“可怕”的力量。作者特意设计了日本军官龟田的形象，他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鱼王庄，但当他见识了这些衣衫褴褛的村民身上蕴藏的韧性时，他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被征服者。他明白了，对中国，“征服”这两个字是不能轻易说的。

——通过讲述鱼王庄的故事，赵本夫称自己“拭去了点点锈斑，擦亮了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一个民族在她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总有逶迤曲折，甚至经历屈辱磨难，就像鱼王庄的村民经历的那样，但她的精神底色和发展大势，是无法被磨灭和撼动的。”同样地，一个“眼纳干江水”



本报记者 余萍 摄

的作家，应具备一种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能透过浮泛喧嚣的表象，提炼出民族的血脉和肌底中，那些真正起主导力量的精神基因。

“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反法西斯战争、抗美援朝，再到今天的抗击疫情，我们民族总是能在一股韧劲的支撑下渡过一次次难关。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总因为眼前面临的一点困难就垂头丧气，这些困难能比抗美援朝更难吗？比抗日战争更难吗？我们还不是都挺过去了，都能顶得住！”赵本夫的话语透着激昂慷慨。他也对当下的一些文学作品提出批评，“有些作家把中国人写得灰头土脸，人们看完后都觉得很沮丧，一点劲头都没有了。这么写是不对的、不符合现实的，也是和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历史、伟大文化不相匹配的。”

“我们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的民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这些远古神话里早就蕴藏着我们民族的基因，我们中国人历来就重视与他人的关系、敢于牺牲奉献、胸怀家国大义。”赵本夫的话语掷地有声。他所生长的徐州丰县，历来兵家必争，各路势力纵横捭阖，这对他的视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叠加效应。赵本夫

笑言：“我们丰县人哪怕缸里没有米，也要村头坐谈天。”

正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读和宏观把握中，赵本夫渐渐获得了一种深沉稳固的自信：《荒漠里有一条鱼》中，他还原出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韧性；《天漏邑》中，他展现了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东方哲学。他还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对着不同肤色、不同文明的读者娓娓讲述中国古人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生命观：以明清家具为例，我们不用一颗钉子，仅靠榫卯结构，就实现了木结构严丝合缝的拼接组合，中国人利用智慧、尊重规律，对自然“保留了最大的尊重”。

在赵本夫看来，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博大包容，博大是因为包容，因为虚心学习吸收一切好的东西，方成其大：“你看中国作家的书架上，几乎都有一个外国文学专柜，这说明中国作家内心坦荡，视野开阔。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国作家也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我就有二十几部(篇)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但我一向认为，在你的作品里，如果能看到别的作家哪怕是经典作家的影子，那就是失败的写作。如果全世界变成一种颜色、一种腔调，这个世界将索然无味，我们中国作家当有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鲁敏：

让个人才能与时代经验融通

本报记者 王慧

18日，第19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天津举行，鲁敏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获中篇小说奖，同时获得本届百花奖的作家还有冯骥才、李佩甫等作家。她的获奖作品的颁奖词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隔绝与疏离将生活切割成无法缝合的碎片，生命失去了清晰的纹理，鲁敏作品以奇特视角呈现并回应了这一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小说借助叙述者的观察，将社会关系构成的认识遮蔽层层剥开，使得完整回忆并重构生活成为可能。

《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以一个离奇的少女自杀案切入，通过流量公号撰稿人为了10万+的采访线索，为读者呈现出当代社会的纷繁芜杂和人性的诡异难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故事？“新生、死亡、命运，都是文学书写的主题。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常常也会更加关切有关死亡、抑郁、绝症等广义的不幸。”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鲁敏说，《或有故事曾经发生》的写作素材来自于朋友圈，当时，一位很少联络的朋友发了他女儿离开的消息，并附了一张甜美的生活照。朋友痛苦而无解，不知孩子为何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我想到了网络上无数类似的消息，想到了很多追踪报道的10万+热搜，想到了媒介放大传播与生活真相之间的某种乖谬与背离。”此后，鲁敏一直留意相关周边素材，尤其是新媒体上那种不断反转、不断刷新、否定之否定、辟谣又辟谣的“常态”，更加深了她对这个写作主题的多层次理解，“最后真正写下的故事，其实是那个杂糅叠加的处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意思——是东南西北不同人物各取其要，复合而成。”

小说即将排版之时，名字却迟迟未定，左思右想，鲁敏最终将篇名定为《或有故事曾经发生》，而这个名字恰恰表达了她对小说的虚构创作与非虚构素材的一个文学理解，“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在处理生活中非虚构素材时，总会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但不论小说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文学之力与文学之美的创造与追求。写作者需要对生活葆有最大的热情与热爱，以独有的书写去呈现人性的力量与美。”

鲁敏的作品，书写过媒体人、相亲者、出租车司机……关注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境遇。如何获取写作灵感？鲁敏说：“灵感是一个比较多元的来源，可以是一手的经验，也可以来自远方或路人，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跟自己的内心发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不仅是创作冲动，还指有创造性的审美塑造，要有‘此时、此在’的这个时代所独有的价值观。”

刚刚闭幕的中国文联第十一次、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鲁敏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受鼓舞的同时，也给她今后的创作带来诸多启示。“正如总书记所说的，写作要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作为一名七十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成长、成熟与改革开放同步，这种个人与时代的水乳交融，也折射并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创作面貌，我们的写作，笔势渐渐开阔，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地关切到贫困与慈善、自然生态、留守儿童与老人关怀、灾难与家园重建、传统文化复兴等‘此时、此在’的中国经验，这是个人才能与时代经验融通结合之后的一种深度与温度。”

在鲁敏看来，我们当下的文学发生机制与传播生态正进行着技术与观念的更迭，这一切给写作者带来了压力，但也让文学现场更为生机勃勃，“如何做到‘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故事、江苏故事的文学表达需要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接棒与努力。”

对于未来，鲁敏的期许是，“希望能与我的前辈和同代人一起努力，写出我所处的这个时空当下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我希望用我的思考来呈现世道人心，记录这斑斓而广阔的现实世界，记录下时代里的细节、温度与一张张面孔。”

鲁敏透露，经过漫长的“跋涉”，自己一部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已抵达“目的地”，成书将于2022年年初正式出版。“这部长篇小说试图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财富观的变迁，尤其是作为创业者的父一代与子女一代，在物质与非物质传承上的观念碰撞，以及这种碰撞中的时代进步。”

